

【主持人语】栏目本期专题为“中国关键语言研究”。

“关键语言”术语来源于美国,相关研究在现阶段受到各国政府重视。关键语言研究兼顾学术性与对策性,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国家语言发展规划,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民族语文教育、语言资源保护利用、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人才培养等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完善高校多语种外语教育规划和语种结构,培养和储备复合型语言人才。”国家的现实需求,使得关键语言研究和关键语言人才培养越发显得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鉴于此,关键语言研究也要秉承“世界眼光、中国立场”的理念,基于我国国情和语情的实际,研究中国本土化的关键语言,在中国语境下,明晰其内涵和外延,以问题和需求研究为导向进行整体规划。如什么因素影响关键语言战略的制定,关键语言是如何动态调整的,国外经验对我国有哪些启示,我国关键语言应该确立哪些语种,如何实施关键语言战略,进行关键语言人才培养,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国情加以思考。

本栏目的3篇文章正是在这一理念下的初步探索,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关键语言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证的多维研究。张天伟和陈练文基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视角,认为关键语言处于一定的语言系统中,是语言沟通关系中的节点语言,并从共时和历时的视角对关键语言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语种关键值概念和量化计算方式。董希晓从中美两国比较的视角,从全球治理理念、外语教育政策、本国语言资源等的对比分析,重新阐释了关键语言的定义。张治国注意到我国跨境语言资源,以及关键语言与跨境语言的交融互通之处,推导出了中国关键跨境语言级别表、与中国共享跨境语言的关键邻国级别表以及拥有跨境语言的关键省份级别表。我们希望本期专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学界同仁对关键语言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

(张天伟)

## 关键语言的理论思考及其关键度比较\*

张天伟<sup>1</sup>,陈练文<sup>2</sup>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2. 武汉大学 文学院/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关键语言概念自美国政府和学界提出并加以实施后,已受到普遍重视。我国关键语言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创新性、实证性、理论性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急需和我国国情结合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文章认为,从国家语言能力维度,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看,关键语言涉及不同语言的交流沟通,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时语言系统中的节点语言,随着语言生活的动态发展而不断变化。对关键语言进行量化研究,比较不同语种的关键度,可以通过需求及其重要性与供给及其供给能力的比值来计算得出,为关键语言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依据。

【关键词】关键语言;国家语言能力;语言关键度;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3)05-0014-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5.002

### 一、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制定关键语言战略和发展关键语言教

\* 【作者简介】张天伟,男,河北承德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句法学;陈练文,女,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汉语语言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外语能力指数构建和中国关键外语战略研究”(22AYY011)。

育这一重要议题应提上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语言文字事业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同样要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历来重视关键语言战略和教育,如何在新时代、后疫情和高科技的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语言生活状况,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关键语言,将关键语言教育发展和战略制定予以“中国化”,加快培养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人才资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 二、关键语言与国家语言能力

### (一) 关键语言概念的提出和实践

关键语言的概念是美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动因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展竞争。苏联人造卫星升天后,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并重视关键语言建设。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后,美国官方于1959年就公布了6个关键语种,提出了关键语种的概念。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意识到语言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启动了国家安全教育项目。而关键语言概念的系统化研究和关键语言教育的体系化建设,则在“9·11”事件之后才开始。2006年美国提出《国家安全语言倡议》后,开始重视关键语言人才培养和关键语言教育。美国关键语言教育主要以国家安全为导向,语种以外语语种及其相关方言为主。张天伟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特点及其相关个案进行了述评,这里不再赘述。<sup>①</sup>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制定和关键语言教育建设,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为导向,不同部门在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对关键语言有不同级别的分类,并进行动态调整,不断扩大规模。相关术语有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优先语言(priority languages)、非通用语言(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s)等。例如根据美国教育部官网数据,2017年,美国教育部列出的优先语言有78种,涉及中国的,包括广东话、赣方言、普通话、闽方言和吴方言;而2022年,美国教育部列出了161种优先语言,涉及中国的,包括广东话、普通话、藏语和蒙古语。由此可见,美国关键语言的制定是动态调整并不断扩大规模的,以满足国家需要。同期202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关键语言列表是104种,涉及中国的,包括普通话和蒙古语。美国国防部的关键语言列表是42种,涉及中国的是普通话。美国能源部是17种,涉及中国的是普通话,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能源部特意强调阿拉伯语所有方言都需要被列为关键语言。美国国务院列出的关键语言是72种,涉及中国的是广东话、普通话、藏语和蒙古语。美国交通运输部列出的关键语言7种,涉及中国的是普通话。美国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列出的关键语言是91种,涉及中国的是普通话和蒙古语。<sup>②</sup>

美国关键语言人才培养的特色是项目集群建设模式,不同政府部门针对不同培养人群,设立了不同的建设项目,如美国教育部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美国国务院的吉尔曼关键需求语言奖学金项目,美国国防部的博仁奖学金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星谈项目等。这些项目凸显了美国关键语言工程建设中,不同部门、不同需求、不同级别、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重点的建设特色。

关键语言的制定以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培养相关语言人才为主要目标,以国家安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导向,语种建设涵盖外语、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学界也逐渐关注关键语言建设,虽未正式提出关键语言的概念,但国家已经重视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进行相关语种规划。如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国家语言发展规划,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sup>①</sup> 张天伟. 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5, (3): 92-96; 张天伟. 美国国家语言服务团案例分析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5): 88-96.

<sup>②</sup> 数据查询自美国教育部官网: <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pe/iegps/languageneeds.html> (查询时间: 2023-10-03)。

民族语文教育、语言资源保护利用、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人才培养等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完善高校多语种外语教育规划和语种结构,培养和储备复合型语言人才。”<sup>①</sup>国内外语类高校扩大小语种专业开设的范围,推动区域国别建设,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实践。

## (二) 关键语言相关研究

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语言进行了多维研究。国外的关键语言研究主要从语言教育政策、国家安全、国家语言能力等维度展开。如 Brecht & Rivers 从国家安全、国家语言能力视角探讨了美国关键语言政策。<sup>②</sup> Potowski 探讨了美国语言多样性,其中也讨论了基于国家安全视角的美国关键语言教育。<sup>③</sup> Liddicoat 从语言规划视角讨论了语言、沟通和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sup>④</sup>后又探讨了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国家安全性,并以土耳其和美国为例,做了个案分析<sup>⑤</sup>。

现有的国内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一是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介绍和相关思考。如刘美兰从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思想来源、发展历程、产生背景、社会现状入手,聚焦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目标定位、战略规划体系的构建、保障措施以及成效和影响的分析<sup>⑥</sup>;李艳红通过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政策和战略措施的分析,阐述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战略规划和关键语言人才培养的措施和路径<sup>⑦</sup>;王建勤、戴曼纯也梳理和探讨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与思考<sup>⑧</sup>。二是对我国关键语言战略和语种规划的研究。张天伟从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当前任务急需4个维度探讨了我国关键语言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sup>⑨</sup>并对关键语言教育中的非通用语建设问题,即要开设多少外语语种、怎么开设,开设什么语种等现实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sup>⑩</sup>;张治国认为关键外语的考虑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综合国力与教育、信息安全、地理位置和语言本身的强弱等,<sup>⑪</sup>他还统计了我国建交国家及未建交国家官方语言(共94门)及其分值,并根据各语言的分值将其分为8个等级<sup>⑫</sup>。三是对区域关键语言战略规划的研究,如郝兴跃、尹枝萍依据关键语言理念,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3种外语规划模式<sup>⑬</sup>。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 [EB/OL]. (查询时间:2023-10-03)

② BRECHT, RICHARD D. & RIVERS, WILLIAM P.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 of Title VI/Fulbright-Hays in Supporting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M]. Dubuque: Kendall/Hunt, 2000. BRECHT, RICHARD D. & RIVERS, WILLIAM P. The Languag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guag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Federal Role [A]. In Baker, Steven ed., Language Policy: Lessons from Global Models [C]. Monterey: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76-90.

③ POTOWSKI, KIM. Language Diversity in the USA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LIDDICOAT, ANTHONY J. Language Planning and Ques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 Overview of Planning Approaches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8, (2): 129-153.

⑤ LIDDICOAT, ANTHONY J. National Security in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 In Catherine, CHUA Siew Kheng et al. eds., Un (intended) Language Planning in a Globalising World: Multiple Levels of Players at Work [C]. Warsaw: De Gruyter Open Poland, 2018: 113-128.

⑥ 刘美兰.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⑦ 李艳红.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与战略规划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⑧ 王建勤.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7-11; 戴曼纯. 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 (4): 585-595.

⑨ 张天伟. 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5, (3): 92-96.

⑩ 张天伟. 非通用语种建设亟须全面布局 [N]. 光明日报, 2017-06-04 (12).

⑪ 张治国. 中国的关键外语探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1): 66-74 + 159.

⑫ 张治国. 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 [J]. 外语教学, 2022, (4): 1-7.

⑬ 郝兴跃, 尹枝萍. 英语还是邻国语: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语规划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3): 413-423 + 480.

虽然我国的关键语言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借鉴性研究多,原创性研究较少,初期研究多是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介绍,此后多位学者也关注我国的关键语言战略,但范围大多还是局限在美国所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教育领域,研究对象还是以外语为主,未能结合中国国情和语情进行拓展;二是思辨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较少,以往多是基于文献进行的宏观性研究,较少通过具体数据对语言的关键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更没有提出通用的计量公式或模型进行测算比较,如非通用语种的关键性已经成为共识,但具体哪些语种更需要优先建设,依据是什么,还需更细致的研究讨论;三是对策性研究多,理论性探讨较少,当前研究多着重于提出对策性建议,但从理论角度对关键语言内涵和外延等进行思考的尚有不足。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国家语言能力的视角对关键语言理论及其关键度进行探讨,利用公式对关键度进行量化分析。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围绕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需求、国家意识等维度,运用语言及其各种手段,处理一切相关事物的能力。<sup>①</sup>关键语言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关键语言资源的了解和掌握是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对关键语言的研究和教育是发展能力的必要环节,通过关键语言提高中文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文影响力是传播能力的重要途径。国家语言能力评价的维度之一是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而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否在国家急需时,能够快速调度关键语言资源,满足特定语言需求。因此,关键语言研究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相结合,首先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从概念、性质等角度进行中国化改造,以更适应我国的语言国情和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语言的关键度也可以通过语言资源的供需关系计量进行比较,从量化角度为关键语言战略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 三、国家语言能力维度下的关键语言

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自美国学者提出并引入到中国后,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管理、发展和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其重要维度,研究对象也由外语非通用语为主的国家外语能力拓展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际中文教育等维度。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资源,关键是语言教育。关键语言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研究领域,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系统化、本土化研究。

#### (一) 关键语言概念的中国式发展

如上所述,关键语言概念自美国提出以来,已经在美国和国际上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但是对于中国语言学界来说,单纯借用这一概念对中国的语言生活进行解释和阐述,并不完全合适。因为中国的语言生活和美国有较大的差别。美国的关键语言是国家安全导向,主要是外语,特别是外语非通用语;而我国的关键语言,应是对国家发展最需要,在国家急需时,起关键作用的语言,范围不一定局限于国家安全。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外语学习、外语教育的关键语言和移民语言,特别是和祖籍传承语密切相关;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语言文化传统的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移民语言给语言生活带来的影响较小,国内的语言问题主要与通用语言和方言、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等关系相关。又如美国提出关键语言战略的原因主要是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与美国遍布世界的军事力量相适应,在反恐压力下重视对恐怖主义、敌对势力语言文化的研究;而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政策和实践主要是面向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教育需要,即使是21世纪以来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关注的是与中国国家影响力相适应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工作。因此,对关键语言这一概念的本土化研究,我们不能照搬美国已有概念,而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和语情,进行重新定义,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实践运用中的关键语言。

语言是人类社会主要的沟通交流工具。从国家层面来说,关键语言战略是为了解决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障碍,处理不同语言间的交流问题,满足国家需要。因此,关键语言本质上是在语言交流关系中起关键作用的语言。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立足于英语这一世界通用语言,解决英语与美国社会语言生活中

<sup>①</sup>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完善与研究实践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5): 12-24.

非通用语言的沟通问题。我国的关键语言战略自然也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但要解决的除了普通话与各外语语种，包括各种非通用语之间的交流问题外，还要解决普通话与各地汉语方言、民族语言、跨境语言以及这些语言互相之间的沟通问题。在这些关系中，关键语言并不限于语种大小、使用人数多少，其关键程度和语言系统中影响沟通障碍的因素更为相关。

在我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语言文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继续推进，为国家战略服务。当前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面对着语言隔阂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感受到国际语言霸权，遭遇了人工智能的挑战，需要解决诸如语言资源与信息传递的安全，语言隔阂带来的民族团结、地域融合，语言濒危导致的传统文化传承，突破国际社会语言霸权、话语霸权来促进中国话语体系的传播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关键语言就是在某一特定的语言生活或语言实践中起到关键性沟通交流作用的那些语言，这些语言与国家利益、国家发展、国家战略等密切相关，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语言资源是具备沟通能力的双语或多语人才。关键语言能力是关键语言资源的培养、教育、掌握、调度能力，其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该领域的语言实践和语言和谐，进而影响国家实力。关键语言在不同时域、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各不相同，它可以是官方语言、外语、民族语言，也可以是各种方言或变体，这些语言或方言只要在特定的语言生活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它就可以称得上是关键语言。

## (二) 关键语言的性质

### 1. 从历史角度看，关键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关键语言的关键，从字面意义理解，是事物最紧要的部分，对事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语言是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其本体结构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语种本身对本体系统而言无所谓关键；但是在实践应用上，语言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交织，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就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当语言因素对社会发展进程起到重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这样的语言或方言就成为了关键语言。

每种语言的产生、发展都与该语言所处的社会密切相关，也和该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联系。中国周代实行分封制，导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天下分割成大大小小的邦国，语言文字也因地域的隔离而分化，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强大的秦朝。统一的政治状态要有相应的语言文字系统来配套，否则，长此以往，战国时代所形成的语言和文字隔阂将让秦的统治得不到六国故地的认同和承认。因此，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削繁就简，用小篆代替六国文字，罢除所有和秦系文字不合的形体写法，通过书面语形式的统一达到了语言统一，最终形成了国家认同。这一过程中，小篆为代表的秦系文字，就是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关键语言文字。它的通用语言文字地位的确立，是由秦国的政治统治地位决定的，但同时也和战国时期各种语言文字出于同一语言系统有关。六国语言文字都是在周代基础上进行的分化和演进，因此，秦以小篆、隶书代替六国文字时，在语言系统内部并未受到太多阻力，主要是从外部通过法律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语言习惯。现代汉语中通用语的形成同样也和中国的语言发展历史相关。20世纪初，国语运动的发展呼唤社会确立共同语的标准读音。但1913年第一次国音审定工作未考虑汉语的系统性和历史传承，通过逐字定音的方式产生了第一套国音标准“老国音”。老国音的语音系统保留了北京话中没有的尖团分别和入声，杂糅了不同语音系统，因而被人们所诟病，并未推行开来。此后，“新国音”的修订工作吸取教训，以北京音作为新国音的标准音。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机构专门开会讨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同样确立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可见在现代汉语标准音的确立过程中，北京话的关键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语言的历史文化传承作用，决定了语言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语言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全国各地语言生活中的关键语言受该国、

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是历史上的语言传承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关键语言的确定需要考虑历史因素的影响。

## 2. 从共时平面看,关键语言是共时语言系统中的节点语言

人类虽然分居世界各地,但整体上依然具有系统性。从关键语言的内涵来看,关键语言必然处于一个共时的语言系统之中。该系统存在多种语言,相互之间有语言交流沟通的需求。不管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只要在沟通交流中起到节点作用的语言都可以是关键语言。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用“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解释和阐述了世界运行的规律。<sup>①</sup>德·斯旺将全球语言看作世界系统的组成部分,提出全球语言系统的概念,并依据不同语言在交际中的价值,即Q值,将语言分为边缘语言(peripheral languages)、中心语言(central languages)、超中心语言(supercentral languages)以及超超中心语言(hypercentral languages)。超超中心语言当然是英语;超中心语言有12种,分别是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中心语言大约有100种。其余都是边缘语言。<sup>②</sup>如图1所示,英语为超超中心语言,汉语、西班牙语等为中心语言,L3、L4等为半边缘语言,1、2、3等表示边缘语言。不同语言相互间进行沟通交流时,需要通过更上层级的语言进行沟通。如L2和L1、4之间可以通过法语沟通,L3、L4只能用汉语进行交流,且L2和L3需要用更上一级的英语沟通。这样各个区域的中心语言成为边缘层级向上沟通的关键语言。



图1 世界语言系统示意图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节点语言并不完全等同于语言系统中的中心语言。德·斯旺的Q值理论是从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审视语言,把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商品看待,从而解释全球语言的竞争、生存与发展趋势,这样,层级越高的语言在系统中的经济价值越大,自然越关键。而社会语言系统中,并不是所有的语言行为都是为了向中心语言靠拢。语言系统中中心语言的存在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沟通成本,从整体角度选择沟通价值最大的语言。但是从语言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角度来说,这种中心语言挤压了其他边缘语言、半边缘语言的生存空间,导致这些语言的衰落、灭绝,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系统内语言生活失衡,成为社会发展不和谐因素。在世界语言依然存在上千种不同语种的情况下,希望通过仅仅十几种中心语言来达到世界语言系统的和谐运转是不可能的。美国提出关键语言概念,正是因为国家安全领域,除了将非中心语言向中心语言英语的转换之外,中心语与非中心语言阿拉伯语、汉语等沟通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因而阿拉伯语、汉语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四卷 [M]. 吴英,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② 德·斯旺. 世界上的语言 [M]. 乔修峰,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等8种语言被确定为首批关键语言,相关语言项目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我国一方面推广普通话,让各族、各地群众相互之间沟通无障碍,另一方面也进行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的保护和传承。在这样的语言实践中,有些整体系统的边缘语言、半边缘语言反而成为了关键语言。如图1中,英语母语者要实现与2号边缘语言的沟通,汉语、半边缘语言L2和边缘语言2都成为了关键语言。因此,关键语言要考虑沟通的目的性,从边缘到中心的角度考虑,关键语言可以是该系统中发挥沟通连接作用的中心语言;从中心到边缘的角度,关键语言也可以是为了特定目的服务而必须掌握的边缘、半边缘语言。

### 3. 从未来发展看,关键语言随语言生活的动态变化而发展

同一个社会在不同时期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特定语言的使用范围随着人口的增减、迁移,民众的教育和学习,政策的规划和保护也不断发生变化。古代地域分割形成了世界上纷繁复杂的语言系统,而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又让语言系统越来越趋同、集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语言系统中的关键语言也会不断变化。

以外语为例,我国外语教育中的关键语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俄语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英语,这些外语通用语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家需要大量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包括国际传播、区域国别、国际组织、高级翻译、稀有语种等人才。而我国现在面临着部分通用外语语种人才培养过度,能进行高级口笔译的通用外语语种人才又缺失,以及稀有外语语种人才不足的局面。北京外国语大学虽然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是国内开设外语语种最多的大学,但这些外语的相关主要方言并未顾及。此外一些语言,如马普切语(智利及阿根廷民族语言)、沃洛夫语(塞内加尔民族语言)、富拉尼语(使用于西非广大地区)等,虽不属于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然而其使用人口较多,或在所处区域涉及国家较多,从外语维度来说,也是除英语、法语等中心语言外的节点语言,是我国需要建设的关键语言。

综上所述,关键语言的确定需要进行多维度、多平面的研究,不仅要当前语言系统的沟通交流需求来考虑,还要考虑社会语言生活的历史源流和未来走向,才能准确把握关键语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三) 关键语言的关键度

量化分析对不同语种在语言系统中重要程度的对比更为清晰明了,但国内外学者以往对关键语言的研究多从宏观视角考虑,较少根据各国语言国情进行量化研究。张治国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根据各国官方语言的信息对我国外语教育进行了分级,得出8个不同语种级别。<sup>①</sup>这种方式是通过不同语种的比较而进行赋值计算,就语种本身来说,其关键性其实更多地和语言系统的供需关系相关。德·斯旺的Q值理论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计算不同语言的价值,<sup>②</sup>但如上所述,关键语言并非完全由其经济价值所决定,而是与所在语言系统的基本语情、政治关系、社会管理等各种因素相关。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的关键语言需要有不同的考量。Brecht & Rivers从供需关系角度分析了关键语言在战术和战略层面的不同表现,他认为战术层面的关键语言由当下需求和市场供给决定,战略层面的关键语言由现在或未来需求与相关语言能力决定。<sup>③</sup>因而本文拟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来计算关键度,更好地展现各种语言的关键程度。

#### 1. 关键度的影响因素

总体来看,关键语言因为是节点语言,承担着所处语言系统的沟通交流作用,因而关键语言资源一般是通晓该系统通用语言和目的语言的双语或多语人才。所以,语言的关键度首先和该系统所需的双语

① 张治国. 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 [J]. 外语教学. 2022, (4): 1-7.

② 德·斯旺. 世界上的语言 [M]. 乔修峰,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③ BRECHT, RICHARD D. & RIVERS, WILLIAM P. National Language Needs and Federal Support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The Critical Role of Title VI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R].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1997.

或多语人才数量相关。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家关系,因而当时需要大量的俄汉双语人才。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接触,政经关系发展迅速,英汉双语人才的需求量大增,英语的关键程度就大大超过了俄语。

同时,由于语言联系着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因而不同领域中,不同语言人才资源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如在我国对外经贸领域中,由于英语在世界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许多跨国公司都以英语作为公司内部的工作语言,因此,英语在经贸事务中的重要性最大。法语、德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其他语种的重要性不如英语,可以根据我国对外进出口数据进行计算。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中,语种的重要性则和尚未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母语人口数量相关,假如其中以维吾尔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大于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口数量,则维吾尔语在这一工作中的重要性大于粤方言。不同领域的工作由于有其自身特点,因而在重要性的比较上所选取的维度并不相同。语言的分布又与地域密切相关,因而关键度在不同地区也各不相同。如语言保护工程中,不同地区的方言、濒危语言并不相同,需要的双语人才语种也不一样。在福建地区进行的语保工作中,闽方言的重要性肯定要大于吴方言;在浙江地区则相反。

关键语言之所以关键,还在于它的稀缺性。当一个语言系统中大家都能使用该语种的时候,双语人才资源供应充足,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对该语言进行教育和推广。只有那些在语言系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语言资源人才时,这些语言才应重点建设和推广。因此,语言系统中起到重要沟通作用的节点语言,当其供给满足或大于需求的时候,可以看成是已建设的关键语言;当其需求大于供给时,则是未来需建设的关键语言,这也说明了关键语言的动态性特征。

## 2. 关键度的计算

按照以上对关键语言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语言的关键度和语言人才资源的需求、领域和地域的重要性成正比,与目前语言系统中所能提供的语言资源成反比。因而,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对关键度进行初步计算:

$$\text{关键度} = \frac{L_1 * I}{L_2 * C}$$

$L$  (Language) 指的是语言系统中特定双语人才资源,  $L_1$  是资源需求数量,  $L_2$  是语言系统中具备该双语能力的资源数量,  $I$  (Importance) 指的是语种重要性,比如不同领域、地域及相关因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和指标计算得出。  $C$  (Capacity) 指的是语言系统中调度、提供已有语言资源的能力。

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语言关键度为例,我国近年来加大与拉丁美洲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国际中文教育需要与国家战略同行,提高在拉美地区的传播能力。<sup>①</sup> 而该地区使用语言较多,我们以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3种语言为例进行比较,计算各语言关键度。首先,根据我国在该地区孔子学院的分布情况,计算不同语种所需双语人才的数量,即  $L_1$ 。<sup>②</sup> 由于国际中文教育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根据一带一路参与国及不同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语种在该地区的重要程度可以计算  $I$ 。<sup>③</sup>  $L_2$  的数据

① 吴应辉,等. 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现状与展望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1, (5): 1-6.

② 数据参见孔子学院官网(孔子学院全球门户网站): <https://www.ci.cn/qqwl/qqky>; 外交部官网: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 (查询时间: 2023-10-03) 根据官网数据显示,拉丁美洲25个国家和地区共有52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其中处于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国家的数量为30,葡萄牙语的为12,英语的为8。按照每所学院或课堂所需教师数量为5人计算得出各语种的  $L_1$  数值。

③  $I$  由各语种孔子学院或课堂的数量占该地区总数量的比值与各语种国家与我国外交关系赋值比值相加。我国与拉丁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可以分为全面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普通建交和未建交关系,各赋值4~0分,拉丁美洲国家共有22个国家或地区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参加国赋值2分,按国家官方语言语种相加后计算比值。具体数据见外交部官网: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 和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html>. (查询时间: 2023-10-03)



则以我国高等院校中3个专业的数量计算。<sup>①</sup>  $C$  假设各语种毕业生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人数比例相同,都为0.05。则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出4种语言在此领域和地域中的关键度<sup>②</sup>,列表如下。

表1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在拉丁美洲不同语言的关键度

语种	$L_1$	$I$	$L_2$	$C$	关键度
英语	40	0.28	496	0.05	0.45
西班牙语	150	1.23	52	0.05	70.96
葡萄牙语	60	0.3	20	0.05	18

可以看出,虽然英语在全球语言系统中处于超超中心地位,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拉美地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关键度都大大高于英语。一方面是因为拉美国家的官方语言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主,中西、中葡双语人才需求量大;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外语教育中英语专业的培养人数远远超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供应能力强大,拉低了英语的关键度。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可见数据进行的粗略计算,关键度的具体计算还需要分领域、分区域进行更为细致的语情调查,详细了解各种语言资源的供需情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

#### 四、结语

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际,关键语言战略和教育应当未雨绸缪,针对我国当前现状和问题,根据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兼顾质性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建立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关键语言战略,并根据我国语言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现状计算不同语言的关键度,通过数据来量化和比较语种的关键程度。这一战略是面向未来的长期过程,既要当前的现实状况做全面把握,也要提前预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未来趋势,因此需要各方面早做规划,长期投入,宁可备而不用,不能需而无备。

### A Study of Critical Languages and Criticality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Zhang Tianwei<sup>1</sup>, Chen Lianwen<sup>2</sup>

(1.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State Language Capacit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9; 2.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uhan, Hubei, China 430072)

**Abstract:** The notion of ‘critical language’ has received global attention since its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Despite this, the study of critical language in China still faces some challenges, such as creativ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since the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fail to fully meet the need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as well as the dimensions of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critical languages concern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node languages in the synchronic language system that have been gradually formed through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continually evolve and change along with dynamics in language life. The quantitative study and criticality comparison of each language within the system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ratio of demand and its importance to supply and its supply capacity, it can provide insights for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critical language strategies.

**Key words:** critical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criticality of languages; language policy

(责任编辑:杨恬)

<sup>①</sup> 数据以软科2023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各语种参与排名的专业数目计算。<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rankings/bcmr/2023>. (查询时间:2023-10-03)

<sup>②</sup> 此关键度并非绝对数值,而是将不同语言置于同一条件下进行对比计算出的相对值,从而对不同语言的关键程度进行比较。因此,各指标的计算数据只要具备可比性,能大致反映该指标的基本比例情况即可。